

中国印象



魏晋清谈与诗歌

刘桂鑫 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印象
魏晋清谈与诗歌

中国印象

丛书主编 戴伟华



魏晋清谈与诗歌

刘桂鑫 著

 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魏晋清谈与诗歌 / 刘桂鑫著. —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18. 5

(诗歌中国)

ISBN 978 - 7 - 5668 - 2389 - 2

I. ①魏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歌研究—中国—魏晋南北朝时代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4204 号

魏晋清谈与诗歌

WEIJIN QINGTAN YU SHIGE

著 者: 刘桂鑫

.....

出版人: 徐义雄
策划编辑: 杜小陆 潘雅琴
责任编辑: 亢东昌
责任校对: 潘江曼
责任印制: 汤慧君 周一丹

出版发行: 暨南大学出版社 (510630)
电 话: 总编室 (8620) 85221601
营销部 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(邮购)
传 真: (8620) 85221583 (办公室) 85223774 (营销部)
网 址: 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
排 版: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
印 刷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张: 6.75
字 数: 130 千
版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次
定 价: 29.80 元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目送歸鴻手揮五絃
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
彼釣叟得意忘筌郢
人折矣誰與盡言

穉康贈香才從軍 戊戌初夏傳子畫



总序

中国是伟大的诗歌国度，诗歌承载着内涵深厚的中国文化。“诗歌中国”的亮相，就是希望用诗来歌咏中国文化的灿烂辉煌。“诗歌中国”不仅要让人们了解诗与文化的关系，而且要让人们通过读诗来感悟中国文化的构成及其品质，体察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可以说，一部中国诗歌史，就是一部中国诗歌文化史。

中国诗歌发展史以“诗”“骚”为其发端，而又影响后世，并形成诗歌的“风”（《诗经》）、“骚”（《楚辞》）传统。

《诗经》展示的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文化画卷。孔子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不学习诗，连话都不会说，当然指说出优美动听的话。不仅如此，结合孔子说的另一段话，所谓“言”还应指言辞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孔子说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这里说的要讲好话，需要认识社会、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认识客观世界的名物。孔子只是举其大概而言。事父事君和辨识事物之名，就是指文化内容。也可以说，“兴观群怨”是提升人际交往中表达的文

化内涵。兴，是联想能力，比如《关雎》，本是要写爱情，却先说鸟的和鸣。《桃夭》是祝贺新婚的歌，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”。以桃花起兴，这样写的好处，既含蓄婉转，又渲染主题。观，是观察能力。凡事未必能亲力亲为，但通过读诗可以丰富生活知识，如读《生民》就可以了解周始祖后稷及其农耕历史，知道作物之名：菽、禾、麻、麦、瓜、瓠，并知道如何形容其状态：旆旆、穰穰、幪幪、嗒嗒，这些词的基本意思是茂盛貌，但有细微差别，如果懂得用不同的词去表达相近的内容，那就能言了，于此才能体会孔子所说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的真正含义。《硕人》对人物的描写，生动传神，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螭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。一连串比喻，写出美人的形貌神采。群，是合群能力，指在群体中适当表述，以达到和谐。读《诗经》的人每每惊叹于其“群”的能力。合群能力事实上是在平衡各种关系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。《诗经》中对夫妻关系多有描写，如《伯兮》，讲女主人与其丈夫以及与君王的关系。“伯兮朅兮，邦之桀兮。伯也执殳，为王前驱。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，岂无膏沐？谁适为容！”伯，为女主人的丈夫，丈夫英武，为邦国杰出人才。丈夫拿着武器，听从君王的命令奔赴前线。在我、伯、王三者关系中，符合各自身份。在三者关系中又突出了“我”在丈夫离家后，甘心思伯而生首疾。“为王前驱”是夫妻分别的原因，这是女子以自豪的口吻来说的，表扬丈夫因为是邦中之杰而能为王前

驱，从中也透出骄傲。怨，是批评能力。“怨”是讽刺，可以解释为批评技巧。《诗经》里怨诗不少，但因比喻而显得含蓄，其中《硕鼠》极具代表性。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！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。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？”一般认为这是一首批判当政者的诗，《毛诗序》曰：“国人刺其君重敛，蚕食于民，不修其政，贪而畏人，若大鼠也。”朱熹《诗序辨说》曰：“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词，未必直以硕鼠比其君也。”朱熹的话比较可信。从诗的字面上看到的只是痛斥硕鼠破坏庄稼，所谓刺君或刺有司是字面以外的意思。这正符合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。

因为孔子诗学的逻辑起点是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，学诗是“言”的需要而不是写诗的需要。所以说，理解“兴观群怨”之说，应该从“言”出发，掌握了诗的“兴观群怨”的言说技巧，讲话就会用“兴”，先言他物而引起所咏之词；用“观”，观察事物人情，以丰富而准确的语言表述意思；用“群”，在群体中明晰关系，并用恰当的言辞表述，以达到和谐；用“怨”，在批评的话语中以中庸的姿态出现，巧妙运用讽刺的手法，既能批评现实，又含蓄婉转。如达到孔子的要求，学诗以后就可以“言”了：可以“兴”言，可以“观”言，可以“群”言，可以“怨”言。

《楚辞》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，宋代黄伯思在《新校楚辞·序》说：“盖屈宋诸骚，皆书楚语，作楚声，记楚地，名楚物，

故可谓之‘楚辞’。”《楚辞》中屈宋诸人之作，都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，其中涉及的神话故事、历史传说、风尚习俗都打上楚文化的印记。《楚辞》中对文化事项的描写也是多方面的，《天问》一篇对天地、自然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等提出 173 个问题。《招魂》中对建筑的描写：“高堂邃宇，槛层轩些。层台累榭，临高山些。网户朱缀，刻方连些。冬有突厦，夏室寒些。川谷径复，流澗漫些。光风转蕙，汜崇兰些。”这里涉及了建筑及其环境。

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辉煌的表现，也是反映文化的重要形式。唐诗名家辈出，文化内涵丰富。盛唐诗是诗歌发展的鼎盛阶段，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王维、王昌龄、高适、岑参、李颀等大家名家的诗歌创作，表现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，形成境界雄阔、含蕴深厚、韵味无穷的“盛唐之音”。“诗仙”李白诗风豪放飘逸，“诗圣”杜甫诗风沉郁顿挫，被誉为唐诗史上的“双子星”。中唐是唐诗的中兴时期，韩愈、孟郊、李贺等人，不仅发展了杜甫诗歌奇崛的一面，还追求诗风的浑厚奇险。白居易、元稹等人则发扬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，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内容，诗风通俗易懂。晚唐是唐诗发展的衰落期，但杜牧、李商隐诗歌自成一格，杜牧为晚唐七绝的圣手，李商隐则努力表现内心世界的情感体验，诗风凄艳浑融，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。

唐诗题材广泛，风格多样，其中山水田园、边塞题材诗在盛唐蔚为大观，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异和通俗易懂两派分立。

以王维、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，继承了陶渊明、谢

灵运写作田园山水诗的传统，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描绘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，表现自己闲适隐逸的情趣。以高适、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，大力写作反映边地生活的作品，描写边地战争，表现出对建功立业的热情和对和平生活的渴望；同时也因描写边地风光和异域风情，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。

中唐出现的奇险诗派和通俗诗派，表现出中唐诗人的开拓精神。以韩愈、孟郊为代表的奇险诗派，又称“韩孟诗派”，这一诗派在诗歌写作上好为奇崛，追求险怪，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，以新奇的语言风格和章法技巧来写作，进一步提升了诗的表现功能。以元稹、白居易为代表的通俗诗派，又称“元白诗派”。这一派在诗歌写作上重视写实、崇尚通俗，他们继承了古乐府的精神，自拟新题，缘事而发，在写作中以口语入诗，力求通俗易懂。

词的产生因燕乐繁盛，宋词是与唐诗并称的一代文学之盛。婉约、豪放争奇斗艳。婉约和豪放是就宋词的主要风格而言的，也是大略的划分，因此婉约和豪放也是相对的。所谓婉约是指文辞的柔美简约，作为词的风格，是以阴柔为审美特征的，内容上多写爱情、婚姻和家庭，也涉及羁旅行役、恋土怀乡等。其抒情注重细腻入微、委婉含蓄。而豪放则是指风格豪迈、无所拘束，作为词的风格，是以阳刚为审美特征的，内容上多涉及人生、社会的重大主题，如理想抱负、民族盛衰、国家兴亡和民生疾苦等。其抒情多慷慨激昂、乐观进取。最早提出词分豪放、婉约二

体的是明人张綖，他在《诗余图谱》中说：“词体大略有二：一体婉约，一体豪放。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，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。盖亦存乎其人，如秦少游之作，多是婉约；苏子瞻之作，多是豪放。”后人则以此梳理宋词，纳入二体之中，遂有婉约、豪放二派。其实分宋词为二派，过于简单，但优点是能看出宋词的基本发展脉络。

人要诗意地栖居，诗意的核心价值 and 美丽姿色在文化母体中浸润、孕育、生长。诗的诞生，实缘于生活中诗意的发现。“物之感人”而有“舞咏”矣。钟嵘《诗品·序》云：“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行诸舞咏。照烛三才，晖丽万有，灵祇待之以致飨，幽微藉之以昭告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”这就意味着：具有诗意的外物才能感动人心，因栖居而有诗意，才能写出诗歌，而诗歌又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具诗意。可补充一句：“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？非长歌何以骋其情。”人要诗意地栖居，构成了人和自然、社会的和谐，形成了诗性的文化生态。

从发生学角度看，“诗言志”的说法值得重新审视。诗首先是叙事。最早的素朴的诗歌已很难寻觅，通常歌谣的开篇是《吴越春秋》中的《弹歌》：“断竹，续竹。飞土，逐穴。”穴，古“肉”字。虽然简短，但仍然可以看出其叙事的特征。叙事，是人类认识世界、认识事物最初的表现方式，此处论断可以稍微缓和一点：如抒情，是人类表现、摹写主体内在情感精神的手段。这样比较中和一点，可避免由对比叙事和抒情高下而带来的可能

性的争议。当叙事时，人类不断认识客观世界；一旦对客观世界赋予个体情感并去表达时，抒情就出现了，以反映人类试图寻找精神世界与自身环境的沟通。

衡之心理学，儿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，应该是从具体认识抽象、从具体认识事物的客观属性再去评价客观事物，而诗歌（歌谣）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言志的过程正和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致的。

诗的文化阐释，不仅要注意诗的本义，还要注意诗的衍义。在写作方面，必然表现诗本义，即诗的本来意义；在阅读方面，通常又会出现诗衍义，衍义即诗的推演意义。对诗的文化内涵理解的不同往往是诗本义和诗衍义的不同。

诗歌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，如地理、交通、礼仪、婚姻、器物、音乐、绘画、书法、建筑、工艺、风俗、天文、宗教等。因此，中国诗歌文化史叙写可以是文化分类的结果。《文苑英华》所收诗歌分天部、地部、帝德、应制、应令、应教、省试、朝省、乐府、音乐、人事、释门、道门、隐逸、寺院、酬和、寄赠、送行、留别、行迈、军旅、悲悼、居处、郊祀、花木、禽兽26类。这一分类也可以视为诗歌中文化事项的呈现。本丛书尚不能包括所有文化类项，只是在文化与诗歌联系的某一方面或角度而立题，目前涉及的有诗与玄学、诗与科举、诗与神话、诗与隐逸、诗与山水田园、诗与民族、诗与文馆、诗与战争、诗与游戏、诗与绘画、诗与书法、诗与锦帛、诗与女性、诗

与礼俗、诗与外交、诗与航海、诗与数字，另有诗与饮食、诗与养生、诗与送别尚在构思当中。当然，在选题的扩展中，我们想给读者一个诗与中国文化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。

美国学者克罗伯说：“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。”诗歌只是作为具体的载体而承担着对人类行为的说明，同样也是人类行为的文化观念、思维方式和情感取向得以阐释的文本。文化具有包容性，当诗歌成为其载体的一部分功能时，就会去表达文化意义，在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哲学、宗教、民俗等角度参加文化的建构与创造。也许人们认识事物会追求概念，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去了解历史、了解社会、了解文化的构成。诗歌虽不指向概念，但以其形象直观，而能了解文化的丰富性、复杂性，更为人们认识中国文化的构成提供活生生的图景。

本套丛书的作者和读者在写作或阅读的过程中或许会融入选择联想，把当下的文化体认、精神生活融入古代诗歌中，实现意义重构和有可能的价值置换。不过，社会的发展，物质文明的进步，并不能以失去传统为代价。相反，文化的母题总是在不断重现与强化，如故土故园、家国情怀、乡村归隐、民俗节庆，这些遥远的歌谣会永远回荡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上空。

本丛书旨在面向普通大众及海外华人、中文爱好者传播中国经典文化，践行学者的社会职责，也可以为专业研究人士提供参考。诗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，也是传统文化表现的载体。以诗歌与文化作为宏观视野，展开具体而微的讨论，形成大视野、大背

景下的小范畴、新角度，追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合一。提倡深入浅出、明白晓畅、雅俗共赏、文采斐然的写作风格。强调著作要具有作者个性，同时也要考虑读者的需求与接受程度。

中国诗歌讲究“言不尽意”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，也就需要读者有丰富的想象去领悟言辞之外的含义。所谓“言不尽意”并不是说言辞能力拙钝不足以表达情感和意志，也不是说言辞受客观情况的限制而不能畅快地表达思想和感情，而是说言辞有限而意义无穷。事实上，“言不尽意”在作者是有意追求的艺术效果，在读者则享有阅读过程中的想象和发挥。言不尽意的效果宛如一幅画：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。”

戴伟华

2017年4月

前 言

汉末魏晋，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，有着独特的成就和地位。

文学的体制和风格，在古代称为“体”。从诗歌体制上看，这一时期四言诗复兴而五言诗确立了主导地位。四言诗自先秦《诗经》以后，创作极为寥落，这种沉寂的局面到魏晋才被打破。曹操、嵇康和陶渊明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，王粲、曹丕、曹植、束皙、潘岳、陆机、陆云等诗人也都有名篇传世。但四言诗的复兴毕竟是回光返照，五言诗却像一颗优质的种子，遇到适宜的生长环境，又得到诗人精心的培养，从而开始茁壮成长，最终绽放出美丽的花朵，成为这一时期诗坛最迷人的靓丽景观。

个体风格、时代风格的形成是某一诗人、某一时代诗歌成熟的标志，是衡量诗歌成就的重要标准。这一时期，出现了不少个性鲜明的诗人，他们各有擅长的题材、体制及独特风格：曹操的乐府诗沉雄悲壮，曹丕的代言弃妇诗便娟委婉，王粲的悯世伤怀诗哀怨秀美，刘桢的咏物诗质朴劲健，嵇康的赠答诗清远高峻，阮籍的政治咏怀诗寄托遥深，潘岳的悼亡行役诗清绮缠绵，陆机

的拟古诗繁缛华美，左思的咏史诗质朴深沉。曹植、陶渊明更是彪炳诗史的一流诗人。曹植骨气奇高而又辞藻华茂，是建安风骨最具代表性的诗人，对五言诗的发展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，而他作为文人失意的典型也强烈激发起后代文人的同情和归属感。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这一新鲜题材，他平淡自然的诗歌是五言古诗发展的一个高峰。他具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固穷气节，又能安贫乐道富有人情味，随时随地在最普遍琐碎的生活中体验到新鲜，因而他的诗成为士大夫保持高洁自由人格的精神堡垒，也是保持心境新鲜灵动的活水源头。至于陆机，在唐以后身价陡减，但实际上他的诗歌创作及理论对整个六朝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又有建安体、正始体、太康体，形成了能够标示时代总体特征的风格。魏晋诗人，比之唐代的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白居易，比之宋代的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、杨万里等，显得不够“大”，在题材、内涵、技法、风格等方面都不够丰富多样，但他们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永远值得尊敬，也是留给后代诗人的一笔精神财富。

魏晋清谈由汉代的清议演变而来，但两者在内容、方式和功能等方面差异甚大。

汉代实行察举征辟制度，这是平民步入仕途的最主要途径。官员选拔的主要依据是“乡评”，要考察被征辟者的家乡对此人的议论，也就是了解此人在家乡的名声。一个人的声名越大，他被征辟的机会越多，他被征辟去担任的职务就越高。清议在这里

指的是乡评。但是在东汉后期，由于皇帝的昏聩、外戚宦官的轮流专权，政治非常黑暗，人才的选拔制度自然也受到严重的破坏，征辟者名实不相符的现象比比皆是，这既败坏国政，也严重地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。比较清正的官僚、无官职的士大夫、中央及地方的学生相结合，在朝野形成一股庞大的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。他们“激扬名声，互相题拂（品评褒扬）；品覈（品评考核）公卿，裁量（甄别、衡量）执政”。这也是“清议”。所谓“激扬名声，互相题拂”，主要是让廉正的官吏、士人、太学生等互相标榜，在自己的群体中推举出一些优秀的人，给予他们名号，并按等级排列，有“三君”（为士林所共同推崇尊奉的人）、“八俊”（八位杰出的人）、“八顾”（能以德行引导他人的人）、“八及”（能够引导他人追随“三君”的人）及“八厨”（能以财物救助他人的人）等。这说明当时士大夫已经结成了有一定组织性的、独立于朝廷政治体制之外的庞大群体。所谓“品覈公卿，裁量执政”，即对公卿等执政者进行品评判定，主要是批评宦官专权乱政。清议，无论是早期局限于一乡（乡评）的还是后来发展到全国性的，都是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恰当与否，“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，即指实人物的品题”。^①用以衡量的标准都是名教礼数，包括儒家的伦理纲常以及朝廷察举的各种科目等。

^① 陈寅恪：《魏晋南北朝讲演录》，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41页。

到了魏晋时期，清谈的内容、功能、方式等变得非常多样化。

清谈主要是析理求知。但理已经不是东汉的儒学政教之理，而是玄理。玄理主要包括“三玄”（《周易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），以及由玄学家提出的新论题，诸如自然名教关系、有无关系、圣人有无情感、言能否尽意、音声有无哀乐等，也有名学论题。东晋佛教兴盛后，佛理也成为重要的辩论题目。在人物品评方面，就人物才智性情推测人物未来吉凶祸福的现象仍然在魏晋继续，《世说新语》中《识鉴》所记载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，但更多的是对人物的性情风度等进行总体的审美把握。《世说新语》所记载的《赏誉》《品藻》《容止》就是如此。品评的方式有时是概念化的语言，如钟会评“王戎简要，裴楷清通”；有时是非常形象的譬喻，如裴楷评夏侯玄“肃肃如入廊庙中，不修敬而人自敬”，“如入宗庙，琅琅但见礼乐器”，评钟会“如观武库，但睹矛戟”，评傅嘏“汪洋（水势浩大）靡所不有”，评山涛“如登山临下，幽然深远”。也有两者兼用的。

清谈的功能不单单在析理求知或人才的品评选拔。在两晋，擅长清谈才能进入士族圈子，获取名士资格，所以清谈是重要的社交方式，非常有利于提升社会地位及进入仕途。清谈是名士日常聚会的主要活动内容，在比较重要的礼俗节日，如修禊、婚宴等，也常进行，所以清谈也成了极具观赏性、娱乐性的智力竞赛。清谈的内容自然重要，但同时清谈者也非常重视清谈时辞气